

华南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中国近代文学研究室

第 7 辑

中国
近代
文学
评论

中国近代文学评林

(第七辑)

华南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编
中国近代文学研究室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杂志社

责任编辑：施 文

封面设计：黄丽雅

中国近代文学评林

(第七辑)

华南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编
中国近代文学研究室

*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杂志社

华南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广州石牌华南师大 邮编：510631)

850X1168毫米 32开本 14印张 390,000字

2002年9月出版

[2002] 粤印准字第0187号

目 录

论岭南晚清文学的特质·····	汪松涛(1)
晚清岭南人的海洋诗·····	管 林(13)
中国近代散文的多重变奏·····	谢飘云(21)
中外文化交流与晚清岭南旅外游记·····	谢飘云(33)
中国近代传奇杂剧的著录和分期论略·····	左鹏军(42)
论戊戌维新与近代人文精神及文学感悟·····	陈永标(53)
维新派目录学的文化内蕴·····	闵定庆(68)
回顾与前瞻:90年代近代文学研究走向及新世纪发展态势 ·····	谢飘云 常 云(77)
章学诚散文的特征及其文学史意义·····	谢飘云(91)
近代岭南女诗人范萸香·····	管 林(103)
论陈澧的教育诗·····	管 林(107)
爱国政治家丁日昌对中国近代化的贡献·····	左鹏军(113)
浙常而外 欲张楚军 ——论王闿运的词学追求 ·····	闵定庆(122)
晚清岭南客家诗人胡曦诗歌简论·····	左鹏军(140)
心路历程的记录 民族精神的高扬 ——丘逢甲诗歌论纲 ·····	谢飘云(148)
诗歌近代化的追寻:进化论与丘逢甲诗歌创作 ·····	谢飘云(155)
略论丘逢甲诗歌的文化情结与抒情意象·····	陈永标(166)
进化论与黄遵宪诗歌近代化的探索·····	谢飘云(178)
钱锺书论黄遵宪述说·····	左鹏军(185)
生命的尊严与卑微 ——江州义门陈氏家规读后·····	闵定庆(202)
“以经术缘饰治术” ——论陈三立的儒学史观和诸子学研究 ·····	闵定庆(212)

陈三立诗学思想蠡测	闵定庆(231)
伦理判断与政治判断的融合与倾斜	
——试论曾朴小说《孽海花》的审美方式	谢飘云 陈鹏飞(256)
论梁启超新文体散文的特征	谢飘云(271)
梁启超的戏曲创作与近代戏曲变革	左鹏军(285)
漫议黄节的人与诗	汪松涛(297)
新旧文化交替潮流中的情与泪	
——苏曼殊诗歌的时代意蕴及其历史意义	谢飘云(301)
誓涤尘垢清人寰	
——论朱执信的诗歌与散文	谢飘云(308)
唾壶敲碎独悲歌	
——陈寅恪先生的几首生日诗	左鹏军(313)
《清诗纪事》九家诗补正	左鹏军(319)
新见近代文学家集外诗文考略	左鹏军(328)
稀见近代传奇杂剧四种	左鹏军(342)
是“我手写我口”，还是“我手写吾口”	左鹏军(346)
关于覃孝方的一点资料	汪松涛(349)
《轩亭冤传奇》作者小考	左鹏军(352)
外国文化与黄遵宪的诗歌创作	梁桂平(355)
从文化差异看拜伦、梁启超的英雄情结	梁桂平(367)
胶着与裂变	
——从“经济”观看桐城派散文的近代化	欧立军(378)
鸦片诗：近代社会文人心态的折光	欧立军(388)
天地雄才梦 砧笳弃妇愁	
——林昌彝的人生态度及其文化意蕴	李 斌(399)
心曲与对话：黄节的诗歌创作历程	常 云(409)
中国近代文学研究论文索引(1995年12月—2001年5月)	
.....	何春华 于 丰(421)
编后记	(500)

论岭南晚清文学的特质

汪松涛

南北朝以后,岭南文化在一种农商并重甚至商重于农的经济氛围下,经历了唐代禅宗顿教和明代白沙理学等学术文化的熏陶,吸收了历代遗民谪宦思想文化的教化,接受了岭南宋明两度作为汉民族王朝的最后灭国之地的战斗洗礼以及自明朝以来的日益频繁的西方文化的影响,可以说,岭南文化不断地获得新的动力,没有停滞,没有僵化,没有太多太重的包袱的负累和人为禁条的桎梏,始终表现出生机。到近代,岭南人在新的时代精神的召唤下,在迫于眉睫的救亡图存的急务面前,在汹涌东来的西学潮水之中,得时代风气之先,弄潮儿在潮头立,岭南文化终于由中华文化中的非主导型文化成长为近代中国的主导文化。强烈的务实意识和经世致用思想,强烈的民族意识与不屈的战斗精神,兼容并蓄博取众长的开放性,勇于探索变革求新的勇气等等,这种较为先进的文化品格,对近代中国的政治与文化生活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有别于内地文化气质,也滋养了岭南晚清文坛,孕育和培植了岭南晚清文学。

一、与国运民生息息相关的岭南晚清文学 ——岭南晚清文学鲜明的现实主义特质

中国文学本来早就具有优良的现实主义传统。从“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曹丕《典论·论文》),到“歌谣文理,与世推移。……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刘勰《文心雕龙·时序》);从“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白居易《与元九书》),到“凡文之不在于六经之旨、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顾炎武《亭林诗文集》卷四,

《与人书》)。历世而下,众多的文学家们在他们所处的时代,往往自觉地以时代、社会的批判者自任,为维护封建王朝的长治久安,呼吁平明之治,揭露社会的弊端,以文学作为为民请命的工具。当社会政治腐败,矛盾丛生,民不堪命之时,统治者亦往往施以文化专制,文学家首当其冲的事例也屡见不鲜。在这种文网森严,统治者在意识形态领域实行高压政策的时候,也有一部分文学家不得已采取了远离现实的避世态度。

1840年发端于广东的鸦片战争,似乎是一下子把人们推进了另一个时代,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堂堂的天朝大国竟然是如此不堪一击。晚清政治的极度黑暗腐败,国力的极端孱弱,殖民者的咄咄逼人、狂妄骄横、必欲亡我而后快,社会是到了变也得变,不变也得变的关口。严酷的现实,无处不在,无事不在,每一个人都必须面对,岭南的文学家们似乎也到了避无可避之地,他们睁眼看现实,睁眼看世界,现实主义很自然成为他们最基本的创作方法。实际的情形也是如此,经过鸦片战争一役,岭南人对于清廷的嘴脸也是看得最清楚的,如果说一些人此前对清廷还抱有幻想的话,此时这种幻想也为目睹清廷在洋人面前的败行劣迹而被粉碎殆尽。张维屏身上的变化是有相当的代表性的,他曾经在名臣循吏的愿望驱使之下,在科举之途奋力攀登,其后又四为县令,克尽职守,堪称尽心民事的好官,终于感到在民情与王命之间无法两全,体会到“一官无补苍生”,而愤然辞官归里。当他回到故乡广州之时,形势已是侵略者的“炮子及于座前”了,他终于以他的如椽之笔写出了讴歌人民自发抗御外侮的不朽诗篇《三元里》,满腔悲愤地道出了“不解何由巨网开,枯鱼竟得悠然逝”这足以振聋发聩的呐喊。

现实是最能教育人的。在现实面前变得清醒起来的岭南士大夫,一方面在他们的文学作品中反映晚清岭南黑暗的社会现实,吏治的腐败,西方殖民者的野蛮侵略,清廷官吏与侵略者的沆瀣一气,狼狈为奸,反映在封建主义、西方列强双重压迫剥削之下的民不聊生;另一方面则是以无比的热忱表现他们对祖国前途命运的探索。这两

类作品的岭南文学家们的文学创作中所占比例很大,从中可见他们对社会现实的关切。前者如张维屏的《衙虎谣》诗:

衙差何似似猛虎,乡民鱼肉供樽俎。周官已设胥与徒,
至今此辈安能无?大县千人小县百,驾馭难言威与德。莫
种察察以为明,鬼域纵横不可测。吁嗟乎!官虽廉,虎饱
食;官而贪,虎生翼。

维屏为令十余年,足迹遍及鄂赣,对清代地方基层政权的黑暗腐败,衙役的虎狼之性与鬼域伎俩是一清二楚的,写来也入木三分。

他如陈澧之《大水叹》,写天灾,实为写人祸;彭泰来之《官征粮》,写官府之横征暴敛,《金水行》写吏胥之讹索扰民;冯询《娘难见》,写饥民血泪;郑观应《鸦片吟》之写烟毒为祸;丁日昌之《决堤叹》,写遍野哀鸿;梁鼎芬《马头店夜》之写时局动荡,西虏横行,兵匪肆虐等等,均为反映社会黑暗,民生多艰的作品。

后者,如张维屏的《金山篇》、《珠江》诗,姚莹的散文《禁阿芙蓉论》,张岳崧的散文《匡俗论》,郑观应的诗《读泰西新史感言》、《商务叹》、《不缠足歌并序》、散文集《盛世危言》,黄遵宪的《日本杂事诗》、《己亥杂诗》、《日本国志》、丘逢甲的《汕头海关歌寄伯瑶》,梁启超、康有为等维新派人士乃至其后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孙中山、朱执信、廖仲恺等人的大量政论散文。或为对社会弊端的抨击,或为对社会变革、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见解,或为对历史经验的分析,或为对西方政治社会制度文化思想的推介,大至国家政体,施政方略,小至民间陋习,无不涉及。我们从中可看出作者对国势艰危之忧虑,对国家前途、民族出路的积极探索,尤其可贵的是他们的种种认识、建议已经完全跳出了传统的理论和思维模式,不再是传统的寄希望于明君良臣,不论是在经济民生方面,还是在社会政制方面,他们所提出的都是一条全新的带根本性的变革之路,如果变用龚自珍的诗句,则可谓“药方并非旧时丹”,因此,这也就赋予岭南晚清文学在运用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方面以鲜明的时代性,这是完全不同于过去的时代,同时较之同时代内地文学作品表现得要更为突出的一点。

二、讴歌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的岭南文学 ——岭南晚清文学强烈的爱国主义特质

自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进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历史阶段,此后的80年间,中华民族承受西方列强的野蛮侵略所带来的深重屈辱和苦难,真是罄竹难书。但是,任何侵略与压迫的结果,必然是人民的反抗。岭南人民在敌人的野蛮侵略与压迫中首当其冲,岭南人民也最先举起反抗外来侵略,捍卫民族生存的大旗。在近代历史条件下,当中华民族遭受到外来异族的侵略,民族危机深重之时,岭南人民强烈的民族意识和顽强的斗争精神,更是空前地得到升华。从虎门销烟、三元里抗英、广州人民反抗英法联军的侵占到19世纪末的两广教案、20世纪初的收回粤汉路权、抵制美货、反对英国攫取西江缉捕权、抵制日货、反对葡萄牙扩大在澳门的侵占等等,岭南人民的反侵略斗争从未停息。猛烈抨击清廷的腐败无能,反映岭南人民乃至全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的伟大斗争,讴歌中国人民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成为岭南晚清文学的重大主题。反映这一主题的诗歌方面的代表作家作品,自然首推张维屏的《三元里》、《三将军歌》,此外尚有彭泰来的《辛丑感事》,梁信芳的《牛栏冈》,三元里之役的参加者何仁山的《团练乡勇住扎四方炮台等处纪事》以及《陈都督父子挽诗》等等。不少广东词人还用词作的形式,一方面谴责清廷的对外妥协投降政策,一方面抒发对外患日亟,国势日危,故里惨遭侵略者铁蹄蹂躏的满腔悲愤。如谭莹的《庆清朝·题〈草檄图〉为徐铁孙司马作》词:

才子从戎,书生杀贼,谁令孤愤难平!临安积习,至今犹讳言兵。孰挽射潮铁弩?东南氛浸冥冥。军书急,愿挥神笔,便斩蛟鲸。

开辟未曾见此,但锦帆颭闪,风鹤频惊。游魂海外,中原偏让纵横。防海将材不少,威名同忆李长庚。还图卷,频看短剑,学请长缨。

谭莹为广东南海人，著名的文献学者，读书宏博，尤擅词赋。他身经两次鸦片战争，感事伤时，故尔语多凄壮。《庆清朝》一首，约作于清道光二十一、二年（1841~1842），猛烈抨击朝廷讳于言兵的“临安积习”，同时表达才子从戎，书生杀贼，愿请长缨，挥神笔，怒斩鲛鲸的一腔爱国豪情，整首词主题鲜明，情感激越，有放翁之风，在清代词作中，实不多见。与谭莹同里的桂文耀，存词虽然不多，但所作多格调高亮，婉丽疏秀，为时人称赏。《扬州慢》一首，写故里烽烟，吊将星西沉，怨愤之情溢于言表，叶恭绰《广篋中词》评云“哀时感事，悲愤弥襟，可入《词林纪事》。”

19世纪60年代以后，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掠日深，豆剖瓜分，鲸吞狼夺，中华民族的民族危机愈加深重，国内变法救亡之议蜂起。岭南大批有识之士逾岭而至中原，在以文学鼓吹维新图强的同时，对列强侵华罪行均有系统的反映。如沙俄侵占伊犁，日本侵占琉球，法国侵占越南，美国之禁约华工，日本侵占朝鲜，中日甲午之战，日本侵占台湾，德国强占胶州湾，沙俄强占旅大，八国联军攻占北京，以我之东三省为战场之日俄战争等等，岭南文学家们的诗文作品对上述历史事件均记述甚详，或记事以抨击清廷腐败，或记事以揭露阉帅之尸位，或纪史实本末以抒发山河破碎之痛，爱国情深，字字血泪。故黄公度、丘逢甲诗有诗史之誉，梁启超诗有“前无古人”之美（康有为氏评梁氏《朝鲜哀词》二十四首云：“义正词严，上承《小雅》，岂愧诗史。其详瞻亦前无古人，诗至此观止矣。”）兹录黄公度之《京师》以为代表：

郁郁千年王气盛，中间鼎盛数乾嘉。

可怜一炬成焦土，留与东京说梦华。

鸱鸢来巢公在野，鸱鸢毁室我无家。

登城不见黄旗影，独有斜阳咽暮笳。

散文方面的表现爱国主义思想主题的代表作品，当推康有为的《强学会序》。这是一篇篇幅不长而洋溢着强烈的爱国情怀，极富感召力的佳作。全文结构精严，波澜起伏，文字简洁而情感激烈，如行

云流水，一气呵成。梁启超《改革起原》云：“康有为撰此开会主义书，痛陈亡国以后惨酷之状，以激励人心，读之者多为之下泪，故热血震荡，民气渐伸。”

岭南晚清文学在表现爱国主义主题的时候，在诗歌创作方面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有不少作品是采用组诗的形式，且多用古风体，这与这一类作品的纪史性是密切相关的。由于一个历史事件，内容含量较大，或者还是一个有一定时间跨度的过程，以中日甲午战争为例，从开端至结束，中间就包含了多个战役和事件，时间也先后跨越两个年头，作者对此全面关注，就必然会形成对整个历史事件的系列反映。而且，这一类诗作，还不仅仅是单纯的事实报导，期间还有作者对事件的评说，作者感情的抒发，五律、七律之类的短制，实在难以胜任。这也是文学作品的形式为内容所制约的一个说明。如黄遵宪反映中日甲午战争的诗作就形成了完整的一组：《悲平壤》、《东沟行》、《哀旅顺》、《哭威海》、《乙未二月二十七日公祭沈文肃公祠》、《马关纪事》、《降将军歌》、《台湾行》、《度辽将军歌》，共九题十三首，其中《马关纪事》，因用五律，故写了五首，余皆为古风体。

三、率先走向世界的岭南晚清文学 ——岭南晚清文学的开放性特质

岭南文化有多元的历史，从百越文化与中原文化的融合始，道教文化对岭南的影响较早。广东的罗浮山早在东晋时已成为全国知名的道教圣地，咸和中，化学家、医学家、著名的道教理论家葛洪（284—363）修道、炼丹、著《抱朴子》于此，从此，罗浮山亦与岭南文化结下不解之缘。南宋后，道教分为南北二宗，琼州葛长庚，号白真人，成为道教南宗五祖之一。南朝时，佛教文化传入中国，印度佛教第二十八代祖师菩提达摩于梁武帝普通元年（520）一苇来华，亦是先至广州登岸，在广州城西建华林寺说法，然后北上至洛阳，于少林寺面壁九年，创立东土佛统，遂成为东土禅宗初祖。唐代时，广东新州惠能，得五祖弘忍传正法眼藏，继承衣钵，成为禅宗六祖。禅宗南宗一花五叶，

不仅影响岭南,更传遍大江南北,乃至日本、朝鲜、越南等地。贞观间,伊斯兰教初祖穆罕默德近臣翰歌士第三次来华,亦取海道至广州,贞观三年(629)于广州城北建怀圣寺,兴教讲学。死葬寺内。明代,天主教、基督教亦率先经由岭南传入中国内地。由上观之,可见岭南文化很早就形成一种多元的文化,在其长期的发展历史中,养成了兼容并蓄,长于吸取的文化品格。这种文化品格在近代西学东渐的文化浪潮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不仅为岭南文化在吸收西方文化营养之后,在晚清由非主导型的地域文化一跃而成为近代中国社会的主导型文化奠定基础,同时也使岭南晚清文学在文学开放与文学交流方面取得丰硕的成果。

岭南晚清文学的文学开放和文学交流,集中地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文学题材和文学表现领域的拓展,产生了大量以中国文学的传统样式反映、表现异域社会政治、文化风情的文学作品;二是众多的岭南作家与域外作家有相当广泛的文学文化交往,留下了许多中外文化交流的佳话。

由于得天独厚的条件,近代岭南的作家们有较多的接触外部世界的机会,或因商务、求学而远涉外洋,如郑观应、容闳、苏曼殊;或出任外交官而旅居西方,如黄遵宪;或因避祸而流亡海外,如康有为、梁启超、麦孟华、潘耒博、马君武。西方世界无异在他们面前展现一片全新的天地,令他们眼界大开。新的思想、新的事物、新的人文景观、新的风情民俗,令他们激动不已,自然而然地要在他们的文学创作中加以表现,藉以抒发他们内心的情感感受,表达他们对外部世界的认知,用康有为、黄遵宪的话说,就是要“更搜欧亚造新声”(《与菽园论诗兼寄任公、耒博、曼宣》),“吟到中华以外天”(《奉命为美国三富兰西士果总领事留别日本诸君子》)。在近代岭南作家中,这类异域题材的诗文作品很多,从中可以使我们强烈感受到岭南作家们走向世界的满怀豪情,而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堪称这方面的大手笔。如黄遵宪的《都踊歌》:

长袖飘飘兮髻峨峨,荷荷!裙紧束兮带斜拖,荷荷!分

行逐队兮舞傞傞，荷荷！往复还兮如掷梭，荷荷！回黄转绿兮摇曳，荷荷！中有人兮通微波，荷荷！贻我钗鸾兮愧我翠螺，荷荷！呼我娃娃兮我哥哥，荷荷！柳梢月兮镜新磨，荷荷！鸡眠猫睡兮犬不呵，荷荷！待来不来兮欢奈何，荷荷！一绳隔兮阻银河，荷荷！双灯照兮晕红涡，荷荷！千人万人兮妾心无他，荷荷！君不知兮弃则那，荷荷！今日夫妇兮他日公婆，荷荷！百千万亿化身菩萨兮受此花，荷荷！三千三百三十二座大神兮听我歌，荷荷！天长地久兮无差讹，荷荷！

近代岭南作家在与外界交往中，留下了不少中外文化交流佳话，从中可以看出中华文化在域外人士心目中的崇高地位，亦可看出近代岭南文学的开放品质。

考察岭南在晚清出现的中外文学交流的这种繁荣局面，究其原因，实与岭南文化的多元历史以及近代岭南文人文化心态中的开放意识有密不可分的关系。由于文化历史的陶冶，在对待域外人士的态度上岭南文人似乎要开通得多，既没有盲目仇外排外的所谓夷夏之防的意识，也不存在那种惧外媚外的奴仆心态，对于域外文士，大体均能以平常心对之，采取平等的以礼相待的态度，可以说，这是进行文化交流，相互吸收，建立友谊的基础。同时由于岭南在近代最先受到东进的西学潮流的影响，在与西学接触的过程中，岭南文人的眼界也更为开阔，产生了广结海外文字之缘，把中华文化推向世界的强烈冲动。

四、逐渐面向大众的岭南晚清文学 ——岭南晚清文学的平民化特质

由于地理、气候等自然条件的特殊性，岭南的经济很早就带有两个鲜明的特征：一是岭南的农业，经济作物种植的比例向来很大，这既是地处亚热带的地理位置所赐，也是岭南山多田少的客观条件所限，而以经济作物为主的农业具有先天的商品农业性质；二是岭南的

商品经济起步较早,自汉以来,广东的徐闻、合浦(今广西之廉州),就是对外商贸交通的重要门户,《汉书·地理志》附“海南航路”对此就有明确记载,直至南宋末年,广州一直是名闻遐迩的东方商贸大港。明清虽屡施海禁,岭南与外部的商贸活动实际上也未能完全禁绝。至乾隆二十二年(1757),广州更被明定为全国对外贸易的唯一口岸。岭南经济的这种历史背景,必然导致两个结果:一是岭南地区城市经济的发展与市民阶层的壮大。据史载,鸦片战争前,珠江三角洲上大小市镇星罗棋布,多达400余个,而广州的人口据外国人的估计“城市人口绝不会少于一百万”(琼斯塔德:《关于在中国的葡萄牙居留地和罗马天主教会的历史概述》);二是文化观念上市民意识的强化。这种市民意识的强化,可以从岭南社会中普遍存在的重商思想、功利意识以及在许多晚清作家的作品中表露出来的具有强烈时代色彩的新观念中得到印证。关于这一点,丘逢甲的《与客谈罗浮之乐,亦言居山之利,因成长句》可以说是一个绝佳的例子:“但作神仙不富贵,赤手上天亦何味?天上金银作宫阙,岂特如来金布地?我愿金成方上天,金光普照莲台莲。何事颜回忍饥面,冷豚一豆人称贤?”

市民阶层的壮大,市民意识的强化,推动了岭南晚清文学的变革,使岭南晚清文学成为中国传统文学近代化的一面旗帜。

岭南晚清文学的近代化,当然首先是文学思想的近代化,而平民化则是它的核心。这又首先表现于晚清岭南作家对文学的社会功能的更为深刻的认识。如鸦片战争时期粤东三子之一的黄培芳,反对把文学作为“泛作应酬”,“徒为贡谀梯荣之具”,强调文学创作干预政治、倡导世风的社会作用,认为文学创作应当“与《春秋》相始终”,“可与国史相表里”,“达而在上,作为雅颂,固足表扬功德;穷而在下,公其美刺,亦足维持世风。”(引文均见《粤岳草堂诗话》卷一)他的观点明显可见明末屈大均的进步文学思想影响的痕迹,但仍未脱“文章经国之大业”的传统认识的巢臼。19世纪70年代,当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政治上的代言人维新派登上政治舞台之后,他们对文学社会功能的认识就更为透辟,这主要是由政治变革的社会需要所促成。社

会既要变革,而社会变革乃民众之事,文学自然成为宣传和动员民众的最佳工具和武器,而传统文学的改造和平民化也就势在必行。这一时期岭南作家在此方面有许多精辟的见解,也进行了十分积极的实践。如梁启超所云:“然则为中国今日计,必非恃一时之贤君相而可以弥乱,亦非望草野一二英雄崛起而可以图成,必其使吾四万万人之民德民智民力,皆可与彼相埒,则外自不能为患,吾何为而患之?此其功虽非旦夕可就乎,然孟子有言,‘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苟为不蓄,终身不得。’今日舍此一事,别无善图。”(《新民说》,《饮冰室全集》第一册,民国五年中华书局排印本)又云:“在昔欧洲各国变革之始,其魁儒硕学,仁人志士,往往以其身之所经历及胸中所怀政治之议论,一寄之于小说。于是彼中缀学之子,膏塾之暇,手之口之,下而兵丁,而市侩,而农氓,而工匠,而车夫马卒,而妇女,而童孺,靡不手之口之。往往每一书出,而全国之议论为之一变。”(《译印政治小说序》,《饮冰室文集》之二)又云:“故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小说与群治之关系》,《饮冰室文集》卷十七)梁启超把新民视为新国图强之本,而又视新文学为新民之要。把文学的近代化与平民化作为觉民新民的要务。

基于这种文学必须平民化的认识,岭南晚清作家在文学的通俗化方面做了大量工作。首先是诗歌创作方面打破严格的格律束缚,多用格律较为宽松的古风体,在用词上力求口语化,“举今日之官书会典方言俗谚,以及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耳目所历,皆笔而书之。”(黄遵宪《人境庐诗草序》)使诗歌创作逐步显现出散文化的趋向。黄遵宪在晚年曾致书梁启超提出他的创造杂歌谣体的构想,“报中有韵之文,自不可少,然吾以为不必仿白香山之新乐府、元西堂之《明史乐府》,当斟酌于弹词粤讴之间,句或三或九或七或五或长或短,可壮如《陇上陈安》,或丽如《河中莫愁》,或浓如《焦仲卿妻》,或古如《成相篇》,或俳如俳技词,易乐府之名,而曰杂歌谣,弃史籍而将近事。”(壬寅八月二十二日《与梁任公书》)黄氏的这种主张,自然不是空穴来风,正是他晚年基于“诗虽小道,然欧洲诗人,出其鼓吹文明之

笔,竟有左右世界之力”(《与丘菽园孝廉书》,《小说月报》八卷一号)这种感受,而致力于“别创诗界”的实践所获得之认识。光绪二十八年,他就以其所作明显创新的近乎后来的白话诗的《军歌》二十四章寄梁启超,次年复又有《小学生相和歌》十九首之作。其目的均在于改造传统诗歌,别创诗格,让诗歌创作更加贴近现实,能为更多的庶民百姓所掌握。与此同时,岭南作家还极为推崇民间歌谣,黄遵宪就有过“念彼冈头溪尾,肩挑一旦,竟日往复,歌声不歇者,何其才之大也”(《山歌题记》)的深沉赞叹。他们注意从民间歌谣中汲取营养,从民间歌谣中获得创作革新上的启示。岭南向有歌风,岭头田边,男女相对而歌,词极浅近,律韵天成,蔚为岭南文化的一道风景,晚清岭南诗人多受其影响,对于他们推动诗体的改革,助益良多。

在散文方面,梁启超首倡“文界革命”,向桐城古文的“义法”、“雅洁”发起冲击,“新文体”风靡文坛,造成了极其广泛深刻的影响。经过“新文体”的一番强力冲击,因其反映时代的节奏太缓、写作过程中束缚太多、不宜于说理(曾国藩语),在晚清已为强弩之末的桐城古文,确实有土崩瓦解之势。而梁氏之“新文体”则伴随着新闻报章的出现,以其平易畅达、感情充沛、纵横恣肆、论说透辟而获得广泛的认同,显示了无穷的生命力。

小说,在诸体文学中,自其产生以来,向以其接近口语,内容具体,情节动人的特点,历来就是与平民百姓最为贴近的一种。近代岭南在小说的创作题材方面,直接从现实取材;在文字方面努力推进言文合一,更加口语化;在表现技巧上,汲取西方小说家之所长,使岭南晚清小说创作出现了极为繁荣的局面,在国内小说界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

戏曲方面,岭南晚清戏曲从咸丰末至光绪初,地方戏曲得以恢复和中兴,一方面是在岭南地方戏曲中占主体的粤剧在同治七年(1868)获得解禁,由此粤剧队伍迅速扩大,戏院林立,戏班众多,演出频繁,“伶人终岁居巨舸中,以赴各乡之招,不得休息。”(俞润庆《荷廊笔记》)所演剧目除大腔例戏《六国封相》、《正本贺寿》以及如《空城

计》、《岳武穆班师》、《黛玉葬花》等传统剧目外,还有取材于现实生活或民间故事传说的一批新戏,如《大闹广昌隆》、《山东响马》、《亚栏卖猪》等等。辛亥革命前后,岭南粤剧更自觉地服务于革命宣传的需要,创作了大量改良新剧,如《地府革命》、《火烧大沙头》、《虐婢报》、《盲公问米》、《熊飞起义》、《徐锡麟行刺恩铭》等等,志士班深入到农村、城镇,甚至远赴南洋,在广大农民、市民和华侨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做了很好的革命舆论准备,成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一个重要角色。

其他较重要的剧种如潮剧、琼剧、广东汉剧,在晚清均有重要的发展。在保留原有风格的同时,或在文字上为适应群体观赏而更注意广泛地吸收口语方言俗语入戏;或在内容上更加贴近现实,以改革陋俗及灌输民族主义为宗旨;或在艺术形式上引进近代科技,大胆创新。总而言之,在近代化的进程中均有长足的进步,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繁荣。

岭南晚清文学,生长于岭南这片神奇的土壤,受到这片土壤上长期积淀形成的优秀思想文化传统的滋养,它又生长于 19 世纪下半叶至 20 世纪初这世纪之交中国风云激变的年代,有幸最先受到美雨欧风的洗礼。既秉承了中华民族数千年文化的良好基因,又陶冶出合乎时代精神的许多宝贵品质。毫无疑问,岭南晚清文学是中国文学中最先进入而又较好完成文学近代化进程的一部分。唯其如此,它在中国传统文学近代化的过程中曾经产生过良好的辐射作用和导向作用,有其宝贵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因而也具有特殊的研究价值。

(原载《岭南文史》2000 年第 2 期)